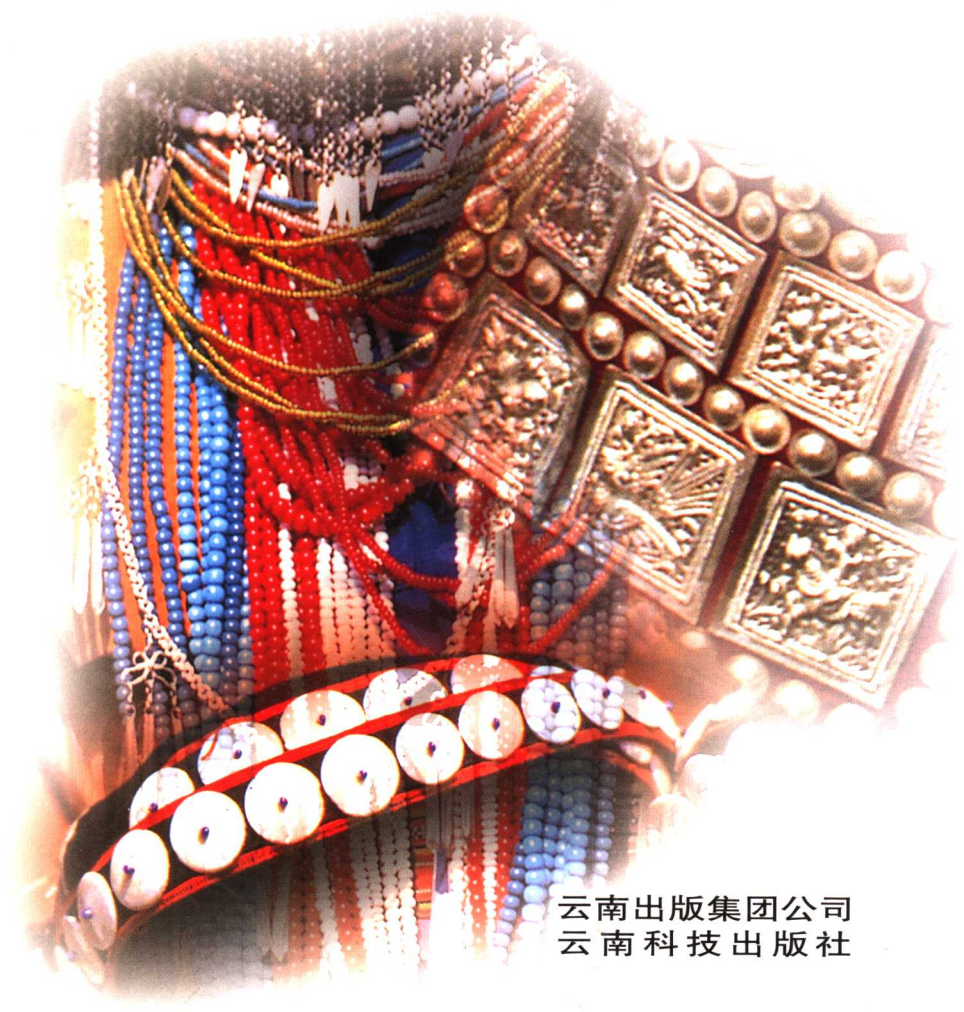


云南民族民间 手工艺品经营

YUNNAN MINZU MINJIAN SHOUGONGYIPIN JINGYING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科技出版社

云岭新农民素质丛书

云南民族民间 手工艺品经营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科技出版社

·昆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南民族民间手工艺品经营 / 蒋文中编著. —昆明:
云南科技出版社, 2006. 12

ISBN 7-5416-2469-1

I. 云... II. 蒋... III. 民间工艺—研究—云南省
IV. J5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5874 号

策划编辑: 长 征 之 召

责任编辑: 明清贤

责任校对: 叶水金

责任印制: 翟 苑

封面设计: 熊惠明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科技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云南新闻出版大楼 邮政编码: 650034)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5.875 字数: 135 千字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7.50 元

《云岭新农民素质丛书》编委会

主 任：吴贵荣

成 员：蔡春生 严 建 李树洁 周鹄昌 孙海清
范建华 周天让 金桂兰 李 凡 李静波
饶南湖 陈 洁 赖永良 牛 霖 张雅琴
刘 荣 陈 乐 杨 丽 秦 穆 刁军培
段洪文 邓 胤 易会安 段 瑛 谭敦寰
李 江 李媛芬 高学明 郭天翼 江云华
陈卫东 宁德锦 伍建军 渠志荣 苏海琳

本书编著：蒋文中

序 言

中共云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张田欣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符合国情、顺应潮流、深得民心的历史选择，是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部署，是加强农业、繁荣农村、富裕农民的重大举措。中央作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决策后，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及时制定了立足云南实际的实施意见，提出了我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要求和重要措施。2006年5月，胡锦涛总书记来云南考察时，对我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全省各地各部门认识统一，行动积极，措施具体，广大农村干部群众加快发展生产、建设美好家园、追求幸福生活的热情高涨，干劲倍增。云岭新农村建设的热潮不断推进，全省上下关心、支持、参与新农村建设的良好态势正在形成。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方方面面。其中，文化建设既是新农村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又可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没有新农民，就没有新农村；没有高素质的农民，就没有新农村建设的快速推进。

省委书记白恩培同志在省第八次党代会的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持之以恒地抓好教育培训，造就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守法纪的新型农民，充分发挥广大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作用。我们要采取有效措施，推进新农村文化建设，努力提高广大农民的整体素质，从而把农村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持久动力。

省委宣传部等部门按照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部署和要求，紧密结合我省农业发展实际，适应农民群众接受能力和水平，组织编写并由云南科技出版社出版《云岭新农民素质丛书》，这是重视农业、支持农村、服务农民，助力云岭新农村建设的实际行动，是推进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具体举措。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运用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广泛开展针对性、实效性较强的读书用书活动，使这套丛书在提高我省农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科技素质和健康素质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希望社会各方面进一步关心、支持、参与新农村文化建设，不断推进云岭新农村建设步伐，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惠及广大农民群众的民心工程，推动我省农村走上生产发展、生态良好、生活富裕的文明发展道路。



目 录

第一篇 历史悠久的云南 民族工艺/1

- 一、书画雕刻工艺/1
- 二、云南民族手工艺文化的特征及分类/16
- 三、云南民族工艺文化的传承和发展/20

第二篇 陶、石、铜、锡、 银手工艺/25

- 一、陶瓷手工艺/25
- 二、石器手工艺/30
- 三、铜、锡、银器手工艺/34

第三篇 木竹器和纺织刺 绣手工艺/38

- 一、木竹器手工艺/38
- 二、纺织染色刺绣手工艺/42

第四篇 云南民族食品加 工工艺/48

- 一、悠久的饮食文化/48
- 二、多样的民族传统饮食技艺/58
- 三、云南民族饮食工艺及滇菜/66

第五篇 云南民族建筑工 艺/74

- 一、云南民族建筑的发展变迁/74
- 二、云南民族建筑特色及传统工艺/79
- 三、云南民族水上交通建筑工艺/92

第六篇 云南民族服饰手 工艺/98

- 一、云南民族服饰文化及特点/98
- 二、各民族服饰工艺特征/107

第七篇 民间手工艺品经 营/113

- 一、工艺品经营市场分析/113
- 二、工艺品经营市场预测/115
- 三、工艺品经营目标市场与营销/118



目 录

第八篇 工艺品营销策略 /127

- 一、工艺品产品生命周期各阶段的营销策略/127
- 二、工艺品产品开发/132

第九篇 工艺品促销策略 /136

- 一、促销组合策略的应用
/136
- 二、促销计划的制定/142

第十篇 工艺品经营三十六计及经典案例 /144

第一篇 历史悠久的云南民族工艺

一、书画雕刻工艺

1. 书画工艺

云南古代民族的先民，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懂得了较早的造型工艺和装饰工艺。云南新石器时代数十万陶器和陶片上装饰着几何形、植物形、动物形等纹饰和刻符，这可以说明书画工艺最早的源头。云南遗存下来的原始绘画是新石器时代的氏族先民画在崖石上的崖画，日前全省发现崖画 20 多处，共 1500 多个图像，其中最突出的还是沧源崖画。

沧源崖画采用简单的剪影式画法，用简单的线条和红色来反映当时这里的原始居民的劳动、战争、狩猎、庆典等一些生活情景。在这些崖画中，有很多符号图形。只有麻栗坡大王岩画用黑、红、白三色绘画，用白色勾勒轮廓，这在我国古代崖画中尚未见到雷同的。

商代以后，与中原地区青铜时代同时，居住在古滇池、洱海、滇西北和红河流域地区的云南民族先民也同样创造了富于地方民族特色的光辉灿烂的青铜器文化，充分体现了当时青铜时代的工艺，成为中华民族古代青铜文化中一支夺目的奇葩。在今天的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呈贡天子庙、昆明官渡区羊甫头等地出土的青铜器集中体现了云南青铜文化的辉煌灿烂。它包含农具和手工业用具、生活用具、兵器、乐器、饰品几大类。有铜锄、铜铤、铜斧、铜镰、铜锯、铜犁、铜铲、铜针、



铜鱼钩、铜纺轮、铜壶、铜盆、铜碗、铜盘、铜杯、铜勺、铜桶、铜灯、铜枕、铜印、铜币、铜剑、铜矛、铜戈、铜钺、铜锤、铜箭、铜弩机、铜鼓、铜锣、铜铃、铜钟、铜镯、铜扣饰、铜簪、铜头箍等一应俱全。在这些青铜器中，每一件都是完整而精美的造型工艺作品，其中最突出的是表现了多达 40 余种动物的造型工艺品，包括动物组合、人和动物的组合，使用圆雕、浮雕立体塑和直接将动物形体浇铸的工艺，其写实性之强、古工艺构思之独特，均让人叹为观止。

古青铜器物中，图案雕刻最多的是在古铜鼓上。已发现的铜鼓均有繁缛精美的纹饰图案和各种写实的图案，一般为太阳纹、几何形花纹、饰弦纹、云雷纹等，动物图案出现最多的是鳄鱼、翔鹭纹，牛纹、鹿纹，还有物体形纹、船纹等。在这些纹饰图案中，太阳纹反映了云南古代民族对太阳的崇拜，它和牛纹均具有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一些共同特征。我国古代把鹿的图像铸在铜鼓上，作为一种祥瑞象征。船纹中所绘的船有渔船、战船、游戏船、竞渡船，有船纹的铜鼓，均为石寨山型铜鼓，船纹成为石寨山型铜鼓的主要纹饰之一。铜鼓上的绘画饰纹，其本身是对当时文化民俗的一种纪实性反映的工艺作品，云南商至汉代的青铜器及造型上的工艺，既有明显受中原文化影响的痕迹，又有着浓厚的云南少数民族特色。文化的交流在青铜器及其造型雕刻绘画工艺上已有明显的说明，从滇池区域出土的青铜器上的饰纹工艺看，战国至西汉对西南夷地区的交通开发，致使沿五尺道的滇东北和滇池地区在青铜器的制作及造型工艺上受中原文化影响更加明显，尤其是滇东北地区。

曲靖八塔台古墓出土文物中，有较多的中原文化的痕迹，如陶鼎等中原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在曲靖的出现，与先秦时期曲靖就是中原文化经“西南丝路”传入云南的咽喉之地有关，表明中原文化传入云南首先是在交通线上的“纽结”地带。曲靖

在受到内地文化影响的同时，又通过古道交通将滇池文化传播出去。曲靖八塔台古墓群中出土的石寨山型铜鼓，在越南东山文化中的基本典型器物中也出现过，表明曲靖的青铜文化通过“西南丝路”对东南亚一带有过影响，由此可见，巴、蜀、楚、滇及东南亚、南亚甚至西亚的文化在这条丝路上交流融汇。

曲靖以北，古西南丝路云南段的更北端的昭通地区，出现了与巴蜀更相近的青铜文化，大量出土中原式剑及秦和汉初的半两钱币，还有脱胎于中原商周文化的饕餮纹戈。汉通西南夷道后，汉族大量进入昭通，进一步扩大了内地文化的影响。出土的以洗、釜、甗、壶、车马器、铜镜、印章为主的汉式器物，表明了昭通在两汉时已基本是汉文化地区。在昭通水富出土的一枚蜻蜓眼似琉璃珠和在昭通市出土的一件高鼻、卷发铜跪俑，或许是由中亚经蜀一身毒道的舶来物。

东汉以后，古代云南受汉文化影响较大的地区在昭通、曲靖等，兴起了深厚凝重的碑刻与书法工艺及内容丰富的汉画像砖和画像石等。这些书画工艺作品中，大小两爨碑代表了这时期最高的工艺水平。

昭通保存至今的孟孝琚碑，碑文存 15 行，每行残存 2 字，现存 250 余字，隶书；左刻青龙，右刻白虎，下刻玄武，残失的上部应刻朱雀，符合汉碑“四神”格式。孟孝琚为昭通“南中大姓”之一。东汉时期“南中大姓”不仅在经济上受中原较高的生产技术影响，在生活上也向中原官僚地主看齐，在文化上崇尚儒学，从碑文中“孔子大圣”字样中可知。此时汉文化已在昭通普及，《孟孝琚碑》的发现，从一个侧面证明汉文化在云南的传播和普及。《孟孝琚碑》在我国书法史上有较高的地位。其字体在篆隶之间，结构方整，笔意圆劲深朴，字画遒劲，是云南最早的百字以上的一块古碑。黄膺评论《孟孝琚碑》：“及古汉碑第一，微独滇南瑰宝，亦寰宇稀世之珍也！”清末云



南状元袁嘉谷称此碑为：“滇中第一石”。方树梅跋《孟孝琚碑》文中有“海内汉碑第一”评价。除《孟孝琚碑》外，古昭通梁堆还发现东汉建初九年（公元84年）刻石，是迄今为止云南发现年代最早的刻石。《孟孝琚碑》和汉建初刻石在昭通的出现进一步反映了昭通作为内地最早开通入云南交通要道之地，汉文化的影响自然十分突出，与昭通同样处于最早通达云南的另一交通重地曲靖，也同样在东晋时产生了《爨宝子碑》（小爨碑）和《爨龙颜碑》（大爨碑）。小爨碑碑文共13行，400字左右，在中国书法工艺史上占有极重要的位置，是晋碑中的佼佼者。碑文为从隶书向楷书过渡的字体，古朴浑厚，自清代出土以来，倾倒无数书法家，至于传拓临摹之人更是数不胜数。俞怀信称此碑“书法朴茂可喜”。李慈铭跋此碑“文甚清雅，字尤遒美，波磔赖发，已开唐隶之风。”李根源评其为“下笔刚健如铁，姿媚如神女”。

《爨龙颜碑》（大爨碑）碑文共24行，每行45字，计904字，在中国书法史上亦享有崇高地位。该碑由清代道光年间金石学家、云贵总督阮元在陆良发现，遂名播海内。阮元对之作评语：“此碑文体书法皆汉晋正传。求之北地亦不可多得，既云南第一古石。”由云龙称此碑为“滇中第一佳石”，“书法雄强茂美，书家亟称赏之”。康有为称此碑“神品第一”，“下笔如昆刀刻玉，但见浑美；布势如精工通人，各有意度，当为隶楷极则”。

“二爨碑”作为书法碑刻上的“南滇瑰宝”，它不仅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云南书法的最高水准，而且也是中国书法工艺的最高水准。

汉晋时，中原开始出现画像石墓和画像石刻、画像砖等。在内地文化的影响下，沿交通线的云南大关、昭通、陆良、昆明、祥云、姚安、大理等地也出土了汉晋时期的画像石和画像

砖。这些画像石和画像砖的题材，主要是“四神”，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汉晋时人们用这“四神”代表天空中的“四象”或“四宫”，即东、西、南、北宫，也就是代表宇宙天空。把“四神”刻画古墓里，墓主人躺在棺内就像生活在另一世界的天空之下。另一题材为西王母，汉朝时迷信升天，梦想长生不死的汉朝人对西王母无不顶礼膜拜，当时常见题材是“日月同辉”、“伏羲女娲”、“耕牛”、“东骑出行”等。此外还有大量的几何花纹以及动物、人物的画像砖。

在昭通，发现一座东晋壁画墓，墓主人霍承嗣曾任郡太守、州刺史、南夷校尉等官职，是滇东北“南中大姓”之一。其墓室四壁用红、黄、赭、黑等颜料，绘有风格不同古拙的壁画，四壁上分别绘有墓主人、持仪仗的家丁、骑兵队伍，还有身披“察尔瓦”、头梳“天菩萨”的彝族，还有大量装饰性的流云、花瓣、莲花和朱雀、玄武、白虎仪仗、鹿、獐、鸟雀、楼房屋宇、莲蓬等。绘画基本是我国古代画帝王将相公侯大吏的手法。所绘的人物、服饰、楼房、车马与东晋时内地的无区别，足见滇东北地区受汉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直至爨氏政权的兴起，闭关自守、与中原地区的交通中断才告减弱。

南诏、大理时期，随着云南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西移，大理成为“蜀一身毒道”的重镇。通往内地的交通线从滇东北移往滇西方向，滇东北地区经济文化逐渐走向衰退，而滇西以大理为中心地区沿古道交通线出现了汉文化和异域文化交错影响，在书画工艺上出现了以《张胜温画卷》、《南诏图传》等为代表的很多超凡的工艺作品，并在这些作品中充分显示了蜀一身毒道沿线文化交流的丰富内容。

《张胜温画卷》（以下简称《画卷》），成画于南宋淳熙七年（公元1180年），全长1636.5厘米，纸本，设色，贴金。清代初期，此画卷被收藏入宫廷，乾隆皇帝十分欣赏，并有题记于



卷首，盛赞“卷中诸象，相好庄严，傅色涂金，并极精彩”。

《画卷》共分三部分：即“利贞皇帝礼佛图”（利贞皇帝即大理国王段智兴，公元1172~1199年）、“天龙八部护法菩萨尊者等”和“十六国主众”。这幅著名的画除主要反映当时礼佛的宗教盛况外，值得注意的是画卷的第三部分绘有十六国王来大理朝拜的情景。这些国王有跣足者，有着鞋者，还有着长靴者，他们头上有的戴冕，有的戴裘皮帽，有的戴虎头帽，有的戴雉鸡尾羽，有的一半裸头。从面貌上看，有深目高鼻者，有满脸胡须者，也有白净无须者，由此可见十六国民族成分的复杂。大理国以前的南诏国王丰祐在大理城建了一座宏伟的五华楼，可容纳万人，主要接待外宾用。据《蒙化府志》载：“宣宗大中十年，晟丰祐建五华楼于国中，以会西南十六国蛮夷之长。”《画卷》这一部分画的也正好是十六个国王，其中一位怀抱宠物（犬）的国王，与剑川石钟山石窟中的印度人面貌近似。另外，戴裘皮帽者当从较寒冷的地方而来。据此，这十六位国王来自南亚、西亚、东南亚国家及宋朝域内一些地方政权和西部地区少数民族。

张胜温《画卷》不仅是一件罕见的工艺珍品，更是民族文化交流的缩影。南诏、大理时期，云南内通中原，外通异域，经济、文化的联系和交流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通过古道交通，使云南成为连接中国和印巴次大陆甚至欧洲的陆上交通枢纽，印度、东南亚的宗教文化、书画、音乐舞蹈在南诏、大理时期得到广泛的传播。从画风看，《画卷》有着浓重的中原工艺流脉，显然和吴道子、武宗元的绘画作品有着血脉相连的承继关系，把中国的技法发挥得淋漓尽致，集佛像、人物、动物、山水于一卷。乾隆皇帝十分钟爱这幅画，赞曰：“大理国画，不经见，历代画谱亦罕有称者。”

《南诏图传》（又称《南诏中兴画卷》），长约5.73米，高

1.7米。整幅画卷有三个主题。第一个主题为“巍山起因”，描绘南诏始祖于古巍山经营、接受观音教化等，以此说明南诏国基业乃“王权神授”。第二个主题“祭铁柱图”，描绘细奴逻成为南诏开国君主。第三个主题为“西洱河等记”，李昆生等认为可能描绘南诏亡国。据研究《图传》的产生时代在大理国时期，《图传》中值得一提的不仅是它的工艺成就，而且还透露出佛教在南诏、大理时期的传播。小青龙佛教密宗在传入云南时与巫教进行了艰苦斗争，并取得“国教”地位。洱海地区广泛流传着“观音伏罗刹”的民间故事，反映了民族原始宗教巫教和“滇密”的斗争。

元明时期，内地汉族大量迁入云南，汉文化进一步在云南得到交流和传播，这一时期云南书画工艺已取得了同内地一样的长远进步。

在壁画方面，迄今存留着元代的晋宁壁画、观音洞壁画和著名的丽江壁画，这些壁画基本是以宗教内容为绘画题材，以弘扬佛理。丽江壁画分布在丽江主城区和玉龙县诸多地方的庙堂、佛寺、道观、尼庵内，均为明代壁画。

从明初以来，丽江纳西族等民族随着对外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进一步加强，崇尚汉文化。从明初至明末，依据佛教和道教经典绘制壁画十分兴盛，迄今在丽江仍保存十余处壁画，以白沙大宝积宫壁画保存最为完好。壁画除以汉佛教、道教文化风格为主外，还受纳西东巴教、藏传佛教的影响，并有浓郁的藏画风格，充分体现了由茶马古道形成藏彝文化走廊的风格。

大宝积宫壁画现有12堵，绘有孔雀明王法会图、如来说法图、观音普门品故事等宗教题材。属佛教密宗题材的有：大宝法王、黄财神、绿度母、降魔祖师、金刚、百工之神等。下面多有藏文名号。还有内容为“远古时期为伟大的释迦而建造的清净无垢的大佛寺”的藏文题记。



丽江壁画规模宏伟，设色绚丽，技法流畅，既有明代内地佛教壁画风格，又有云南地方特色。壁画的作者有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画家。《丽江府志略》上记载的著名画师有马肖仙，“江南人，工图画。山水臻神品，花卉、人物靡不精妙，识者称为马仙画。西域闻其名，延去数载，后复归丽”。在万德宫碑文中还有“画工古宗古昌”，可知藏族古昌也是主要作者之一。从壁画风格判断，有的是汉族、白族画师的作品，有的则出自汉族、藏族画师之手，融几个民族绘画风格于一体，不仅有很高的工艺价值，而且是各族人民文化交流的见证。

元明时期，云南产生了一大批著名的书画家，如担当、白丁，其中集诗、书、画于一身，工艺造诣最高者是滇籍书画家担当。担当祖籍浙江，自幼聪颖，曾漫游江南，拜师学画，晚年在云南出家。担当诗、书、画精湛，他的画简笔淡墨，追求神似而不求形似，多为山水兼人物。在书法上，字体工整而苍丽，豪迈奔放，气势磅礴，尤其是狂草，运笔放纵老辣，飞跃跳荡，不受束缚。

元明清时期，云南纳入内地中央王朝的统治下，尤其是明清改土归流，在封建统治和文化教育下，大力提倡孔教，尊儒和科举制，内地先进文化与云南民族文化进一步融合，书画工艺的发展也到达一个更高的高度。清代，产生了大批书画家，见著名录的达120余人，其中最有成就和影响的有阚桢兆、周于礼、尹壮图、孙髯翁、钱沣、李诂、周其淳、孙铸、缪嘉蕙、杨应选、袁嘉谷。以上均为中原传统画法。与汉文化传统书画工艺同时，云南各地少数民族也创造了自己富于民族特色的书画工艺。

清代壁画主要集中在小乘佛教寺内，分布于孟连、勐海、澜沧、瑞丽等县市。壁画的内容主要以佛经故事和民间传说为主，具有浓郁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和东南亚文化工艺的特点。

清代反映少数民族风俗的画，较有代表性的有巍宝山的《踏歌图》，描绘边疆傣族地区的《承象图》、《沐浴图》以及反映苗族、瑶族风情的《苗瑶斗牛图》等。这些绘画作品既受到汉文化绘画技艺的影响，又兼收东南亚工艺的手法，同时更具有云南少数民族传统特点，进一步显示了云南民族多元文化交流的工艺特色。

2. 雕塑工艺

云南民族的雕塑工艺，当首推从石器文化到青铜文化时代就流传下来的石刻、石雕工艺和青铜塑刻工艺。

青铜塑刻工艺

商代至西汉时青铜器，从已发掘出的看，其器形种类繁多、复杂，每一件均可视为完整的工艺造型，它们当中除生产工具、兵器以外，其他器具，尤其是娱乐、祭祀、装饰器具更具工艺观赏性。这些器具中，有很多具浓郁的地方民族工艺特点。

在青铜造型工艺上，古代冶铸青铜器所使用的模范有石范、陶范、泥范、蜡范等。在云南当时使用最多的是泥范。泥范使用方法在我国已有三四千年的历史。在我国最先使用失蜡法铸造工艺。云南也是我国较早使用失蜡法铸造青铜器的地区之一。河南南浙发现的春秋时期的铜镜和铜盂，就是用失蜡法铸造的。云南晋宁、江川出土的很多战国、西汉时期的青铜贮贝器，如“战争器盖铜贮贝器”、“纺织场面器盖铜贮贝器”、“杀人祭铜柱铜贮贝器”、“贡纳场面铜贮贝器”上的人物、场景造型，均是用失蜡法铸造的。这些人物神情各异，五官、四肢栩栩如生，这种高精度的铸造只有用失蜡法方可成功。这些铸造方法，有的可能是云南先民自创，也有的可能是受内地影响和交流发展起来的。

从一些特种工艺上看，战国时，内地进入铁器时代，云南在铜器的铸造上已可使用铁刀线刻工艺，最著名的代表作品有